

DOI:10.19832/j.cnki.0559-8095.2025.0043

修复“衰败土地”：20世纪前期犹太移民对巴勒斯坦地区的环境想象与治理

应添翼，闫伟

(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中东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129)

摘要：近代西方将巴勒斯坦描绘为与《圣经》中截然不同的荒凉之地，并将此归咎于阿拉伯人。犹太复国主义兴起后，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西方对巴勒斯坦的环境叙事，但赋予自身“双重使命”，即修复巴勒斯坦“衰败土地”并救赎犹太民族。伴随犹太移民的到来及其对土地的大量购买，犹太人在上述环境叙事的影响下，开展排干沼泽与植树造林等大规模环境改造活动，致力于消除疟疾和提高土地生产力，进而修复所谓的“衰败土地”，加强犹太民族认同。环境叙事和实践改善了犹太移民的生活与生产环境，使他们与巴勒斯坦建立了历史与现实的连接，成为之后以色列进行环境改造的模板。但这种排他性叙事和环境改造加剧了阿拉伯和犹太两个民族间的矛盾，埋下了冲突的隐患。

关键词：犹太移民；环境叙事；巴勒斯坦；巴以冲突

巴勒斯坦地区^①在犹太人的宗教传统和复国主义运动中占有中心地位。近代巴勒斯坦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土地贫瘠且缺乏水源，与“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相去甚远。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试图构建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的合法性，将巴勒斯坦的历史记忆与现实中的复国主义运动相结合，从而进一步向巴勒斯坦移民并强化民族认同。其中，对巴勒斯坦的环境叙事及环境治理，是犹太人对该地区的历史记忆与现实进行连接的重要手段。这种环境叙事深受近代西方对西亚北非，尤其是巴勒斯坦地区的环境衰退论和文明退化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以色列建国后的环境观念与实践，为后来的巴以关系和巴勒斯坦问题埋下了隐患。

国外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以色列的环境、景观生态保护及环境立法等方面，^②虽论及20世纪前期犹太移民排沼和造林等活动，但大多聚焦环境议题本身，忽略了这些环境改造实践

收稿日期：2024-08-17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编中东国家通史(多卷本)”(LSYZD2102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应添翼，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闫伟，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东社会史。

① 巴勒斯坦(Palestine)一词源于希腊作家对腓力斯丁人(Philistines)居住地的称谓，此后被罗马人作为该地区行政区域的名称，并逐渐成为称呼该地区的常用术语。巴勒斯坦地区位于地中海东岸的狭长地带，历史上该术语所指定的行政区划和地理区域发生过较大变化。本文探讨的是巴以分治之前的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其地理范围南至内盖夫沙漠和亚喀巴，北至加利利地区，东至约旦河，包含现代以色列、加沙、约旦河西岸，而非当前的巴勒斯坦国。

② 参见 Alon Tal, *Pollution in a Promised Lan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Israe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Daniel E. Orenstein, et al., eds., *Between Ruin and Restoratio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Israel*,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3。

背后的社会观念,尤其是对犹太民族构建的影响。^①近年来,戴安娜·戴维斯(Diana K. Davis)提出“环境东方主义”(Environmental Orientalism),^②对中东环境叙事进行文化解读,开启了中东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这对重新审视近代以来以色列的环境叙事和实践提供了新视角。^③国内学界则鲜有直接论及以色列环境史的成果,相关研究未从环境叙事的角度进行深入阐释。^④本文重点论述20世纪前期犹太移民环境叙事和观念形成的历史进程,分析这种观念对巴勒斯坦生态环境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以期对全面认识巴勒斯坦相关问题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一、衰败的异域:近代西方对巴勒斯坦的环境想象

19世纪以来,西方在殖民扩张中对异域的认知具有“环境退化论”的色彩,将亚非拉的自然环境描绘成面临生态灾难且处于崩溃边缘的衰败景观。这种“环境想象”在西方广泛传播,后者以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当地发展为名,通过所谓的“文明使命”进行殖民扩张。按照近代西方的主流叙事,古代西亚北非地区的生态环境优越、土地肥沃、社会繁荣,然而从伊斯兰时期开始,当地人进行了“原始”的农业和游牧活动,将优渥的生态环境破坏殆尽。因此,为了修复衰退的环境,殖民者占据土地并进行农业改造,为其殖民活动提供合法性。^⑤

在《圣经》中,巴勒斯坦是拥有所罗门王的花园和宫殿的繁荣之地。在奥斯曼帝国统治初期,鲜有西方人访问这一地区。^⑥随着西方对巴勒斯坦的殖民渗透,对后者的环境认知也逐渐深入。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短暂占领巴勒斯坦,使其再度引起西方的关注。19世纪中叶,围绕“东方问题”,欧洲列强在奥斯曼帝国展开争夺,巴勒斯坦被视为奥斯曼帝国治下的“穷乡僻壤”,亟待西方文明“救赎”。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巴勒斯坦市场对外开放,西方国家对巴勒斯坦的兴趣大增。大批西方人怀着殖民占领、朝圣或环境改造等目的来到巴勒斯坦,很多人在此定居。19世纪50年代,奥斯曼帝国修订《土地法》,使外国人在巴勒斯坦购置地产成为可能。一些德国、美国和瑞典的基督徒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并建立了农业定居区。^⑦

西方人往往通过文学、摄影、绘画和游记等不同方式记录巴勒斯坦的环境,这些作品本身成为对巴勒斯坦的环境建构,进一步引起了西方人对巴勒斯坦的关注及对其环境的再想象。19世纪末,随着千禧年主义引发的宗教热情,古老的巴勒斯坦越发受到西方的关注。巴勒斯坦从《圣

① 参见 Sandra M. Sufian, *Healing the Land and the Nation: Malaria and the Zionist Project in Palestine, 1920–1947*,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Irus Braverman, “Planting the Promised Landscape: Zionism, Nature, and Resistance in Israel/Palestine,” *Nature Resources Journal*, Vol. 49, No. 2 (2009), pp. 317–365; Hadas Yaron, *Zionist Arabesques Modern Landscapes, Non-Modern Texts*, Boston: Academic Studies Press, 2010; Alon Tal, *All the Trees of the Forest: Israel’s Woodlands from the Bible to the Pres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② 参见 Clemens Hoffmann,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as Orientalism: The Geo-political Ecology of Crisis in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Vol. 31, No. 1 (2018), pp. 94–104。

③ 参见 Diana K. Davis and Edmund Burke III, eds., *Environmental Imaginarie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④ 国内研究主要从记忆、身体和疾病治理等相关角度探讨20世纪犹太民族身份建构,尚未出现从环境史角度探讨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参见张倩红:《历史记忆与当代以色列国家认同的建构》,《世界历史》,2019年第6期;艾仁贵:《塑造“新人”:现代犹太民族构建的身体史》,《历史研究》,2020年第5期;胡浩、刘源:《头癣治疗运动与以色列现代国家形象的建构》,《史学月刊》,2024年第7期。

⑤ Timothy Mitchell, “Are Environmental Imaginaries Culturally Constructed?” in Diana K. Davis and Edmund Burke III, eds., *Environmental Imaginarie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p. 266。

⑥ [美]巴巴拉·W.塔奇曼著,何卫宁译:《圣经与利剑:英国和巴勒斯坦——从青铜时代到贝尔福宣言》,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00–102页。

⑦ Michelle U. Campos, *Ottoman Brothers: Muslims, Christians, and Jews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Palesti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2。

经》中的插图艺术形象变成了一个地理上的神话。^①例如,美国印刷的《圣经》包含了大量伊甸园式的插图,表达了对巴勒斯坦作为宗教圣地的想象,将其描绘为遍布鲜花、奶与蜂蜜的土地。^②然而,西方人到达巴勒斯坦后往往对当地的环境感到失望,发现其与宗教经典中的记载并不一致。英国旅行作家亨利·沃勒姆·莫顿(Henry Vollam Morton)在访问巴勒斯坦后感叹道:“那里没有华丽的东方。”^③

在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下,西方转而强调该地区的荒凉和衰败。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是较早来到巴勒斯坦的游历者。1806年10月,他在耶路撒冷停留一周。在他看来,当时的耶路撒冷神秘、阴森而病态,这里遍布“小教堂、祈祷室和清真寺的废墟”,当地的建筑物“方方正正,低矮厚实,既无烟囱,又无窗户,有平顶的,也有圆顶的,看起来要么像监狱,要么像坟墓”。^④墓地、废墟、监狱和死亡等字样充斥在他对耶路撒冷的描述中。西方人试图在巴勒斯坦寻找想象中的基督教古迹,然而却目睹了单调、荒凉、神秘和病态的景象。

马克·吐温也曾于1867年访问巴勒斯坦,其畅销作品《傻子出国记》向公众宣扬了荒凉和空旷的巴勒斯坦形象,成为19世纪西方著名的有关巴勒斯坦的记录。他写道:“死海上面,或者沿岸一带,根本没一样悦目的东西和生物。这是片炙热、荒芜、讨厌的荒野”,“整个地方笼罩着灾祸的阴影,害得田地就此枯干”,“历史上最庄严的名城,久负盛名的耶路撒冷,如今已失却古代一切显赫气派……当年所罗门的财宝曾经赢得前来朝觐的东方女王赞赏不已,如今早已化为尘土”。^⑤

当时的画作和摄影也试图展现巴勒斯坦的景观。苏格兰画家大卫·罗伯茨(David Roberts)创作的巴勒斯坦风景画一度广泛传播。罗伯茨作品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其画作完美地迎合了当时西方公众对巴勒斯坦的想象:被沙土覆盖的纪念碑、倾倒的柱子、杂草覆盖的废墟,这些意象构成了一个在西方现代性之外封闭、冻结的空间,这种“废墟美学”展现了当时西方人对巴勒斯坦的凝视。^⑥许多英国和法国的摄影师前往巴勒斯坦,带回的照片也与西方世界对巴勒斯坦的传统认知形成反差。^⑦这些照片将耶路撒冷呈现为空旷与死气沉沉的地方,而阿拉伯人很少出现在照片里,使这片土地显得似乎无人居住,只有在《圣经》等宗教题材的作品中才会出现当地人的身影。^⑧这些画作和照片在当时的欧洲广为流传,强化了当时欧洲人对巴勒斯坦的认知与偏见。巴勒斯坦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似乎已萧条和衰败不堪,但它依然对西方有着重要的意义——西方人由此赋予自己修复巴勒斯坦的使命。

巴勒斯坦人也成为环境想象的一部分,被赋予负面形象——无知、愚昧,抗拒现代文明。一些学者将巴勒斯坦的衰败归结为气候变化,但更多的人则认为是巴勒斯坦人使然,^⑨其农业和育种技术落后,导致巴勒斯坦地区水土流失严重。^⑩在西方人看来,巴勒斯坦曾具有无与伦比的发展潜

① 李小姐:《19世纪美国传教士在中东地区的传教活动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21年,第56页。

② Colleen McDannell, *Material Christianity: Religion and Popular Culture in Ame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89.

③ H. V. Morton, *In the Steps of the Master*, New York: Dodd, Mead & Company, 1954, p. 3.

④ [法]夏多布里昂著,曹德明、徐波、杨玉平译:《从巴黎到耶路撒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页。

⑤ [美]马克·吐温著,陈良廷、徐汝椿译:《傻子出国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21、533、534页。

⑥ Vincent Lémire, *Jerusalem 1900: The Holy City in the Age of Possibili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p. 46.

⑦ Issam Nassar, “Photography as Source Material for Jerusalem’s Social History,” in Camille Mansour and Leila Fawaz, eds., *Transformed Landscapes: Essays on Palestine and the Middle East in Honor of Walid Khalidi*, New York: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9, pp. 137–138.

⑧ Issam Nassar, “Photography as Source Material for Jerusalem’s Social History,” in Camille Mansour and Leila Fawaz, eds., *Transformed Landscapes: Essays on Palestine and the Middle East in Honor of Walid Khalidi*, p. 139.

⑨ W. C. Lowdermilk, *Palestine, Land of Promise*, London: Golancz, 1946, p. 155; Arie S. Issar and Mattanyah Zohar,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Heidelberg: Springer Berlin, 2004, p. 4.

⑩ Alon Tal, *All the Trees of the Forest: Israel’s Woodlands from the Bible to the Present*, p. 35.

力,但巴勒斯坦人对环境的破坏造成了生态的衰败。英国探险家乔治·怀曼·伯里(George Wyman Bury)甚至认为:“巴勒斯坦南部的阿拉伯人过着‘半野蛮的生活’……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已经回到了中世纪。”^①

事实上,古代大量文献曾记载了古代巴勒斯坦地区繁荣的农业景观,但这些文献却在19世纪后被西方选择性忽视。中世纪抵达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十字军在目睹当地农业景观时感到震惊,发现此处“覆盖着耕地与大量果园与花园。这里有面积广阔的甘蔗种植园,柑橘树、香蕉树和椰枣树……正茁壮生长”。^②现代考古勘探也发现,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并不必然导致巴勒斯坦的环境退化,^③7世纪巴勒斯坦的气候恶化并没有阻碍内盖夫等地区大量新定居点的建立与大规模灌溉农业的发展,阿拉伯人征服巴勒斯坦也并未伴随着巨大的破坏,而是延续了罗马时期的繁荣。^④阿拉伯人掌握着先进的农业技术,并在10—13世纪通过发达的贸易网将糖、棉花、大米与柑橘类水果从印度带到埃及和西班牙等地中海地区,这些作物及栽培技术的传播在当地引发了社会变革。伊斯兰世界在防治病虫害、使用肥料和灌溉等方面曾拥有先进的专业知识,其统一与扩张使得高粱、小麦、甘蔗和西瓜等作物及先进的耕作技术向外传播,掀起了“伊斯兰绿色革命”。^⑤

综上所述,西方在19世纪对东方的环境想象,是在东西方的商业与政治交往日益密切、双方冲突不断显现的背景下,西方想象出一个不断衰败的东方,体现了西方与东方间的权力关系。在这种知识权力之下,当地阿拉伯人的本土生态智慧被完全否定,并被视为巴勒斯坦环境衰败的责任人,从而为英国基于自身利益支持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铺平道路。

二、从衰败到救赎:犹太环境叙事的生成

在犹太人大流散期间,巴勒斯坦仍然是其历史记忆的中心。在犹太人看来,巴勒斯坦的历史似乎是静态的,“流着奶与蜜之地”成为其根深蒂固的印象,被毁坏的圣殿与《旧约》的神话故事成为长存的历史记忆。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西方殖民者对巴勒斯坦环境叙事的变化,衰败的巴勒斯坦更加生动地呈现在世人面前,犹太人开始重新认识巴勒斯坦。^⑥巴勒斯坦的现实与尘封的历史记忆相去甚远,其原有的浪漫主义形象逐渐破灭,反映出西方与东方的环境繁荣—衰败二元论。^⑦犹太人则认为他们负有改造衰败土地的使命,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则成为巴勒斯坦环境改造的模板。

19世纪末,大量欧洲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他们认为,犹太人的第二次大流散是巴勒斯坦衰败

^① George Wyman Bury, *The Land of Uz*, London: MacMillan, 1911, p. xxi, in John Broich, “British Water Policy in Mandate Palestine: Environmental Orientalism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 19, No. 3(2013), p. 266.

^② P. Guichard, “Mise en valeur du sol et production: De la ‘révolution agricole’ aux difficultés du bas Moyen Age,” in J. C. Garcin, et al., eds., *Etats et Sociétés et cultures du monde musulman médiéval: Tome 2. X^e–XV^e sièc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0, pp. 175–176, in Salah Zaimeche, *Agriculture in Muslim civilisation: A Green Revolution in Pre-Modern Times*, December 25, 2001, https://muslimheritage.com/agriculture-in-muslim-civilisation-a-green-revolution-in-pre-modern-times/#_ednref65, 2024-04-29.

^③ 从现有证据来看,地中海沿岸的生态环境并未以某种方式不可逆转地退化,也没有遭受任何持续的气候干旱,更不能直接得出结论认为环境退化完全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参见 Diana Davis, *Resurrecting the Granary of Rome*,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9–12.

^④ Uzi Avner and Jodi Magness, “Early Islamic Settlement in the Southern Negev,”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No. 310(1998), p. 39.

^⑤ Andrew M. Watson,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in the Early Islamic World: The Diffusion of Crops and Farming Techniques, 700–11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⑥ Ilan Troen, “Frontier Myth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America and Israel: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6, No. 3(2000), p. 1211.

^⑦ Suzana Sawyer and Arun Agrawal, “Environmental Orientalisms,” *Cultural Critique*, No. 45(2000), pp. 71–74.

的起点,使其从古代犹太人时期的鼎盛退化到奥斯曼时期的贫瘠状态。^① 这种观念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的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在日记中写道:雅法充满“贫穷、痛苦和同性恋般的色彩”,哭墙遍布着“丑陋、悲惨的乞丐”,在耶路撒冷的小巷里弥漫着恶臭。而耶路撒冷的地理位置事实上非常优越,尽管当前它正处于衰败中,但“如果我们来到这里,它可以再次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② 赫茨尔撰写的小说《新故土》描述了犹太人将巴勒斯坦建设成一个布满现代设施与铁路的新世界,电线交织在地上与地下,管道里流动着天然气与水。^③

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环境叙事,与其移民计划密切相关。巴勒斯坦地区为何衰败,当地的阿拉伯人在其中发挥了何种影响?犹太人通过回答上述问题,试图与巴勒斯坦建立现实的联系。在西方影响下,犹太人形成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一是认为气候导致巴勒斯坦环境退化。受到美国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的影响,^④ 一些犹太人将干旱视为巴勒斯坦环境衰败的原因。考古学家马塔尼亚·佐哈尔(Mattanyah Zohar)认为,气候干旱导致巴勒斯坦早期文明的周期性崩溃,中东文明的重大变化与全球气候的变迁相吻合,^⑤ 然而这种观点并不占据主流。1960年出版的《希伯来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Hebraica*)反驳了埃尔斯沃思·亨廷顿的观点,该书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巴勒斯坦发生了显著的气候变化,该地区湖泊的水位没有发生明显下降。^⑥ 第二种观点认为“沙漠民族”的入侵导致了环境的退化,这种观念在20世纪前期就已形成,在以色列建国后仍为主流观点。这种观念源于西方对阿拉伯人的认知,认为“沙漠民族”对定居区的频繁入侵导致了环境和城市文明的衰退。以色列学者迈克尔·埃文里(Michael Evenari)、莱斯利·沙南(Leslie Shanan)和纳夫塔利·泰德莫尔(Naphtali Tadmor)等人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将巴勒斯坦的沙漠化问题归咎于“沙漠民族的入侵”。^⑦ 他们认为,犹太人的到来可以纠正阿拉伯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重新使这片土地适宜数百万犹太移民居住。^⑧ 犹太人将巴勒斯坦作为复国之地后,需要重新解释当地阿拉伯人与巴勒斯坦的关系等问题,并凸显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天然联系及其对巴勒斯坦进行现代化改造的使命。其潜台词在于,犹太人移民不仅不会加剧巴勒斯坦的环境衰败,反而有助于扭转这种状况。

犹太人试图着力解构阿拉伯人与巴勒斯坦地区的联系。^⑨ 在许多欧洲犹太人看来,巴勒斯坦的历史是停滞的,仍然是犹太人的故土与精神家园。1914年,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⑩ 将巴勒斯坦形容为“为无地之民准备的无主之地”。^⑪ 他没有否认当地阿拉伯人的存在,而是强调巴勒斯坦缺少现代文明。巴勒斯坦被描绘为类似美洲和非洲的未开发“处女地”,当地的阿拉伯人也被视

① Eviatar Zerubavel, *Time Maps: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Social Shape of the Pa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pp. 16–18.

② Raphael Patai, ed., *The Complete Diaries of Theodor Herzl*, trans. by Harry Zohn, New York and London: Herzl Press and Thomas Yoseloff, 1960, pp. 745–747.

③ Alon Tal, “Enduring Technological Optimism: Zionism’s Environmental Ethic and Its Influence on Israel’s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 13, No. 2(2008), p. 276.

④ 埃尔斯沃思·亨廷顿是20世纪早期著名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将气候视为塑造人类文明格局的主要环境因素,提出巴勒斯坦古代文明在气候与降水的周期性震荡当中走向崩溃。

⑤ Arie S. Issar and Mattanyah Zohar,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 New York: Springer, 2007, pp. xxiii–xxvi.

⑥ Arie S. Issar and Mattanyah Zohar,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p. 5.

⑦ 参见 Michael Evenari, et al., *The Negev: The Challenge of a Deser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⑧ Ilan Troen, “Calculating the ‘Economic Absorptive Capacity’ of Palestine: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Us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Contemporary Jewry*, Vol. 10, No. 2(1989), pp. 19–38.

⑨ Rashid Khalidi, *Palestinian Identity: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01.

⑩ 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后来曾担任以色列第一任总统。

⑪ Uri Eisenzweig, “An Imaginary Territory: The Problematic of Space in Zionist Discourse,”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Vol. 5, No. 4 (1981), p. 282; Paul Goodman, *Chaim Weizmann: A Tribute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London: V. Gollancz, 1945, p. 153.

为传统社会的一部分,处于现代化进程之外,需要西方加以救赎。^①然而事实上,在19世纪末,巴勒斯坦地区已有将近50万人口。^②1891年,犹太复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阿哈德·哈姆(Ahad Ha'am)曾指出,巴勒斯坦“很难找到尚未耕种的耕地”,阿拉伯人占有良田,留给犹太人的土地都是“沙土和石山”。^③但这类事实很快不再被欧洲犹太人所重视。

犹太复国主义者将巴勒斯坦环境的衰败归咎于阿拉伯人,指出当地阿拉伯人过度放牧和伐木取材,使良田被毁、沼泽遍布,耕地与定居点面积不断缩减,沙丘持续扩大,最终巴勒斯坦只剩下绵延不断的沙漠与疟疾肆虐的沼泽地。他们认为,阿拉伯人没有技术和能力改变巴勒斯坦的衰败,而犹太人通过建立定居点,能够使巴勒斯坦得到重建与复兴。^④即使是主张维护阿拉伯人权益的犹太知识分子伊扎克·爱泼斯坦(Yitzhak Epstein)也认为,犹太人有权通过知识和汗水,重新征服其祖先的土地,将巴勒斯坦从干旱和荒凉的困境中拯救出来。^⑤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者大卫·戈登(A. D. Gordon)声称:“我们的国家曾经是流着奶与蜜的土地,具有高等文化的潜力,但现在却无比荒凉、贫穷与空虚——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我们对土地的权利,暗示这片土地一直在等待我们。”^⑥

在此基础上,如何对巴勒斯坦进行环境改造,不仅是对环境的认知问题,而且涉及犹太人移民和复国的实践。对他们而言,犹太人需要通过农业劳动建立与土地的有机联系,^⑦改造巴勒斯坦的衰败面貌,而不只是在地理上迁徙到巴勒斯坦。^⑧如若不然,犹太人还将在巴勒斯坦的衰败环境中继续病态的流散生活。这种救赎观使“旧犹太人”向“新犹太人”转变,使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生活在巴勒斯坦,创建世俗的、生产性的社会。换言之,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环境改造活动深度联结。这不仅在于犹太人向巴勒斯坦迁徙并获取土地,而且在于重塑犹太人的民族性。犹太民族的救赎与巴勒斯坦环境的改造是一体的。

当时以亚博廷斯基(Ze'ev Jabotinsky)为代表的修正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这种环境与民族的双重救赎观念并不认可,^⑨但其不能代表主流观念。伴随着大量犹太移民的到来和定居点建设,以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为代表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者将环境改造付诸实践,成为后来以色列建国的重要意识形态和环境改造的基础。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者认为,想要恢复巴勒斯坦的活力并复兴圣经时代的美好,就必须通过大规模的生态活动彻底改造巴勒斯坦的环境面貌。在19世纪末第一次阿里亚(Aliyah)^⑩期间,迁徙而来的犹太人就已经开始自觉改造环境。西奥多·赫茨尔在日记里说道:“只有大规模排水与消除沼泽,这里才适合居住。”^⑪在1903—1914年第二次阿里亚运动期

① Beshara B. Doumani, “Rediscovering Ottoman Palestine: Writing Palestinians into History,” in Ilan Pappé, ed., *The Israel/Palestine Ques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10–12.

② 参见 Alexander Schölch, “The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of Palestine, 1850–188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7, No. 4 (1985), pp. 485–505.

③ Ahad Ha'am, “Truth from Eretz Israel,” trans. by Alan Dowty, “Much Ado about Little: Ahad Ha'am's ‘Truth from Eretz Yisrael,’ Zionism, and the Arabs,” *Israel Studies*, Vol. 5, No. 2 (2000), pp. 160–162.

④ Iru Braverman, “Planting the Promised Landscape: Zionism, Nature, and Resistance in Israel/Palestine,” *Nature Resources Journal*, Vol. 49, No. 2 (2009), pp. 341–342; 参见[美]W. J. T. 米切尔编, 杨丽、万信琼译:《风景与权力》, 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第275页。

⑤ Boaz Neumann, *Land and desire in Early Zionism*, Massachusetts: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87.

⑥ Yael Zerubavel, “Desert and Settlement: Space Metaphors and Symbolic Landscapes in the Yishuv and Early Israeli Culture,” in Julia Brauch, et al., eds., *Jewish Topographies: Vision of Space, Traditions of Place*, Burlington: Ashgate, 2008, pp. 205–206.

⑦ 艾仁贵:《塑造“新人”:现代犹太民族构建的身体史》,《历史研究》,2020年第5期。

⑧ Shlomo Avineri, *The Making of Modern Zionism: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Jewish Stat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p. 135.

⑨ 参见 Eran Kaplan, “Decadent pioneers: Land, Space and Gender in Zionist Revisionist Thought,” *The 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 Vol. 20, No. 1 (2001), pp. 5–12.

⑩ 阿里亚(Aliyah), 希伯来语意为“上升”,指的是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地区的大规模移民行动。第一次阿里亚发生于1882—1903年,东欧和也门的犹太人自发组织移民巴勒斯坦,创建了一批重要的定居点。

⑪ Raphael Patai, ed., *The Complete Diaries of Theodor Herzl*, p. 740.

间,巴勒斯坦出现了成规模的犹太社会(基布兹),开始大规模地改造巴勒斯坦的生态环境。他们试图通过种植树木恢复土地的生机,通过排干沼泽治愈土地的疾病。^①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不断宣传这种环境改造观念,塑造美好的愿景,吸引西方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并获得支持。1915年,本·古里安抵达美国,宣扬犹太复国主义。他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移民不是为了统治当地的阿拉伯人,而是通过劳动来救赎巴勒斯坦,改变在长期流散中退化了的犹太人,重建自己的家园。他认为,在犹太移民的带动下,巴勒斯坦的生产力将得到提高,犹太人开发阿拉伯人无法耕种的土地,将带来现代化的农业技术与资本,^②尤其是将对内盖夫沙漠的治理作为以色列建国的重要基础,以此证明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合理性。^③

犹太移民计划利用医学、昆虫学、农学和兽医学等现代科学知识,引进欧洲和美国的先进技术,募集资本用以修复土地。^④犹太人定居点和城市景观也借鉴欧洲的风格,多采用直线和方格形式,形成简洁有序的开阔空间。他们重视通过现代技术复原《圣经》中的古代景观,犹太民族基金会^⑤(The Jewish National Fund)早期的任务之一,便是分析土壤、气候和植被。^⑥该基金会推动开发内盖夫沙漠等阿拉伯人无法利用的地区,借助先进的灌溉技术使其重新展现古代肥沃花园的样貌。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环境叙事受到西方的直接影响,认为巴勒斯坦处于衰败状态。但与西方所不同的是,犹太人具有修复巴勒斯坦衰败环境的使命感,因而构建了衰败—救赎的叙事模式。犹太人将其民族历史记忆植入其中,强调阿拉伯人对环境的破坏,而犹太人有能力将巴勒斯坦从贫瘠、落后的状态修复成一个生机勃勃、健康与富有生产力的现代生态环境。借此,他们试图建构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并进行生产实践的合理性,为犹太人的环境改造、民族性重塑及移民社团的建设等实践活动奠定基础。

三、修复衰败土地:环境叙事驱动下的环境治理活动

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环境叙事不仅在于建构犹太移民的合法性,而且旨在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包括如何吸引欧美的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如何改善巴勒斯坦的生存环境,以及如何加强犹太移民社群的团结等。环境叙事成为建构犹太民族身份的制度化工具。^⑦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环境的改造具有所谓双重救赎的性质,既改善生活环境,又改造犹太人的民族性格。他们认为,巴勒斯坦的大片沼泽和沙漠是一种病态的象征,也是犹太人大流散的寄生性的隐喻。自19世纪末以来,排干沼泽和植树造林既是对环境的救赎,又被视为对犹太人自身的救赎。他们试图将巴勒斯坦恢复到阿拉伯人到来之前的状况,实现犹太人与巴勒斯坦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

① Boaz Neumann, *Land and Desire in Early Zionism*, Waltham: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93–94.

② 参见[美]赛斯·西格尔著,陈晓霜、叶宪允译:《创水记:以色列的治水之道》,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20页;Aharon Kellerman, *Society and Settlement: Jewish Land of Israel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45–247.

③ Joseph F. Getzoff, “Zionist Frontiers: David Ben-Gurion, Labor Zionism, and Transnational Circulations of Settler Development,” *Settler Colonial Studies*, Vol. 10, No. 1 (2020), pp. 75–83.

④ Libby Robin, “Ecology: A Science of Empire?” in Tom Griffiths and Libby Robin, eds., *Ecology and Empir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ettler Societi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p. 65.

⑤ 犹太民族基金会成立于1901年,创建之初的目标在于募集世界范围内犹太人的捐款,购买巴勒斯坦土地并进行开发或垦殖,将其转化为犹太人的集体财产。参见Ravit Hananel, “Zionism and Agricultural Land: National Narratives, Environmental Objectives, and Land Policy in Israel,” *Land Use Policy*, Vol. 27, No. 4 (2010), p. 1161.

⑥ Irus Braverman, “Planting the Promised Landscape: Zionism, Nature, and Resistance in Israel/Palestine,” *Nature Resources Journal*, Vol. 49, No. 2 (Spring 2009), p. 335.

⑦ 参见[美]彼得·L.伯格、[美]托马斯·卢克曼著,吴肃然译:《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9页。

在第一次阿里亚期间,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环境治理规模相对较小。第二次阿里亚的先锋精神^①兴起后,犹太人开始有组织、成建制、大规模地进行环境改造。犹太民族基金会及其下属的巴勒斯坦土地开发公司(Palestine Land Development Company)^②主导了土地购买和生态改造,资助犹太移民建立了基布兹和莫沙夫(Moshav)^③等定居点,支持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和环境治理。在20世纪上半叶,上述活动保障了犹太社团的生存,激发了犹太人的复国热情。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改造,犹太人得以扎根巴勒斯坦,为以色列建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排干沼泽与净化“病态”环境

19世纪,巴勒斯坦的沼泽集中分布在沿海平原与内陆谷地。在北部哈代拉(Hadera)和南部阿什凯隆(Ashkelon)之间的中部沿海平原,分布着500~800个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的沼泽,集中在雅法以北。^④其他沼泽分布在北部沿海平原、耶斯列谷地、贝特谢安谷地、萨努尔谷地和胡拉谷地等地区。19世纪后期,大量欧洲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沿海平原和谷地的沼泽区域自然环境恶劣,疟疾高发、人口稀少,但这些土地相对容易购买。在英国委任统治之前,犹太人的定居点大都位于这些地区。1945年,犹太人所拥有的66%的土地集中在谷地和沿海地区。至委任统治时期结束时,犹太人占有巴勒斯坦23%的沿海平原、30%的北部谷地和4%的山地。^⑤

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犹太移民积极对生态加以改造。尽管奥斯曼帝国晚期加强了公共卫生建设,但疟疾、霍乱和伤寒等流行性疾病仍长期在巴勒斯坦肆虐。沼泽的普遍存在为各种疾病的传播提供了条件,排干沼泽有助于根除疟疾等传染病。大片沼泽的存在也限制了犹太移民的活动空间,治理沼泽地不仅能够增加巴勒斯坦的耕地面积,而且可以推动犹太定居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吸引更多移民。

此外,排干沼泽具有抛弃“寄生”的强烈隐喻,有助于塑造新的犹太精神。犹太移民将沼泽地视为巴勒斯坦土地与犹太民族的病态象征。大卫·戈登曾说:“我们必须与各种寄生现象斗争,这种寄生现象也植根于我们之中。”^⑥犹太人试图通过体力劳动实现自我改造,克服经济上的寄生性。^⑦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犹太人民与其古老土地之间的内在联系是犹太民族发展的必要条件。^⑧在现实中,加强生产劳动,改造衰败和病态的土地(沼泽地)能够重新建立这种历史联系,进而改变犹太人大流散时期虚弱、胆怯、不从事劳动生产的病态形象。哈伊姆·魏茨曼提出:“似乎上帝已经用岩石、沼泽和沙子覆盖了巴勒斯坦的土地,所以它的美丽只能由那些热爱它并将毕生致力于治愈其伤口的人来展现。”^⑨因此,对环境的救赎也被视为犹太民族自身的救赎。排沼活动还被塑造为犹太移民与疟疾传染病的斗争,是一场对“不健康”的“畸形土地”的征服过程,也被视为犹太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沼泽地展开了大规模治理,深刻改

① 源于希伯来语,音译为哈鲁兹(Halutz),意为开拓犹太定居点的先锋(The Pioneer),旨在训练青年从事农业和植树造林等土地开垦活动。参见 Boaz Neumann, *Land and Desire in Early Zionism*, p. 80。

② 巴勒斯坦土地开发公司(PLDC)成立于1908年,主要从事土地购买与开发活动。

③ “莫沙夫”为犹太社会组织,是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合作型农业社区,实行土地私有、本人劳动和共同销售的发展模式。

④ Ruth Kark and Noam Levin, “The Environment in Palestine in the Late Ottoman Period, 1798–1918,” in Daniel E. Orenstein, et al., eds., *Between Ruin and Restoratio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Israel*, p. 12.

⑤ Jacob Metzer, *The Divided Economy of Mandatory Palest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86.

⑥ Zeev Sternhell, *The Founding Myths of Israel: Nationalism, Socialism and the Making of the Jewish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63.

⑦ 沼泽地常与疟疾联系在一起,疟疾通常由被按蚊叮咬或带疟原虫患者的血液传染。这种传染方式使犹太人联想到自己以商业和借贷为生、不事生产的寄生状态。参见 Sandra M. Sufian, *Healing the Land and the Nation: Malaria and the Zionist Project in Palestine, 1920–1947*, p. 24。

⑧ Yael Zerubavel, *Recovered Roots: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Making of Israeli National Tra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 15–17.

⑨ Chaim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im Weizmann*, New York: Harper, 1949, p. 371.

变了当地的生态景观。犹太民族基金会和巴勒斯坦土地开发公司购买土地后,排干沼泽通常与犹太移民定居点建设和拓荒运动同步进行,对定居点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19世纪末,雅法北部的佩塔提克瓦(Petach Tikva)、凯撒利亚(Caesarea)南部的哈代拉(Hadera)等早期定居点曾经疟疾肆虐。经过近十年的努力,这些定居点的沼泽地被排干并变成良田,定居点居民的健康状况也得以改善。到20世纪,犹太民族基金会成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的重要机构,并广泛参与复国主义运动,为各个定居点的排沼活动提供资助。《贝尔福宣言》极大鼓舞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复国热情,为犹太民族基金会购买土地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1920年,犹太复国主义大会进一步明确了犹太民族基金会的职能分配与土地购买政策,使其土地购买活动急剧增长。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分布在耶斯列谷地、马阿甘·迈克尔(Ma'agan Michael)基布兹附近的喀巴拉(Kebaa'ra)、泽沃伦(Zevulun)谷地和贝特谢安谷地的大部分沼泽均被排干。^①

巴勒斯坦北部耶斯列谷地的排沼活动尤为关键。20世纪20年代以后,犹太民族基金会在购买土地时会优先考虑将土地连接成片,避免犹太定居点的孤立或分散。购买耶斯列河谷能够有效促成犹太定居点在地理上连接。^②基金会购地代理人约书亚·汉金(Yehoshua Hankin)认为,耶斯列谷地具有巨大的农业发展潜力,能够为犹太移民提供更多农业用地。为此,他为购买耶斯列谷地而开展长期谈判,购得谷地西部的纳哈拉尔(Nahalal)和东部的努里斯(Nuris)地区。此后,犹太人在纳哈拉尔建立了第一个莫沙夫定居点。然而,耶斯列谷地遍布沼泽,大量洼地与水坑为按蚊的繁殖提供了便利。泛滥的沼泽淹没了低洼地区,形成季节性沼泽与永久性沼泽,使得这些地区疟疾肆虐。为此,德国建筑师理查德·考夫曼(Richard Kaufman)将纳哈拉尔的莫沙夫设计为圆圈排列,包含内外圈。内圈容纳公共设施与工人住所,外圈容纳牲畜,以此减少疟疾传染。^③犹太工人总工会(Histadrut)^④也参与到排沼活动中,以促进移民就业。大量资金被用于纳哈拉尔与努里斯两地的排水活动,约400人在当地从事耕作、排水、灌溉和修筑道路等工作。犹太劳工采用机械设备,修筑地下排水管道,改变水流方向。1924年,犹太移民已基本将该地区的沼泽转变为良田,定居点几乎再未出现疟疾新病例。耶斯列谷地排沼活动激发了犹太人的民族自豪感,也为犹太人实施现代农业革命提供了良好条件。他们将谷地沼泽开垦为肥沃的农业土壤,引进合成肥料与机械设备,大力发展高投入的技术密集型农业。

与此同时,沼泽地的排干计划加剧了犹太移民、阿拉伯人与委任统治政府的纠纷。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将沼泽地视为未开发的无主荒地,政府有时愿意将这种土地租给犹太人,鼓励他们排干沼泽和治理疟疾。^⑤然而,沼泽地为当地阿拉伯人提供了独特的生态资源,排沼活动往往破坏了阿拉伯佃农的生计,遭到了阿拉伯人的反对。^⑥以色列北部的纳米恩(Na'amien)沼泽是巴勒斯坦最大的沼

① Yoram Yom-Tov, "Human Impact on Wildlife in Israel Sinc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Daniel E. Orenstein, et al., eds., *Between Ruin and Restoratio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Israel*, p. 60.

② 巴勒斯坦裔美国历史学家拉希德·哈利迪(Rashid Khalidi)认为,犹太人定居点形成的“N型”模式是土地与人口的有力支柱。“N型”具体指代犹太人在西至地中海沿岸、北至加利利湖和中部耶斯列谷地形成的连片定居点,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N型”。参见 Rashid Khalidi, *Palestinian Identity: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p. 98; Baruch Kimmerling, *Zionism and Territory: The Socio-Territorial Dimensions of Zionist Politics*,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3, p. 40.

③ Kenneth Helphand, "Dreaming Garden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srael," *Landscape Journal*, Vol. 22, No. 2(2003), p. 76.

④ 该组织成立于1920年,由犹太复国主义各个劳工政党组建,目标在于促进犹太移民活动。

⑤ 委任统治政府也开展了部分排干沼泽的活动,希望以此缓解疟疾传播,但其排沼范围主要集中在城市周边。

⑥ 1858年奥斯曼帝国实行新的土地法后,大量阿拉伯农民成为佃农,拥有对未开垦荒地的耕种权。犹太人排干沼泽的措施改造了当地的水文环境,往往会对阿拉伯佃农的农业、渔业和放牧活动产生危害,造成阿拉伯人流离失所。犹太购地机构往往需要给阿拉伯农民支付补偿金,或者为他们预留出足够的土地。参见 Barbara J. Smith, *The Roots of Separatism in Palestine: British Economic Policy, 1920-1929*, Syracuse, N. 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pp. 92-93; Kenneth Stein, *The Land Question in Palestine, 1917-1939*, pp. 80-172.

泽地之一。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尚未将土地购买与开发的重点放在该地区。到 30 年代以后,该组织多次提议政府组织排干纳米恩沼泽。1932 年,英国卫生部门首次提出排干纳米恩沼泽的计划,包括加深河道、挖掘排水沟和填平低洼地等措施,目标是将该沼泽改造为渔业区。^①然而由于资金不足,该计划未能实施。1935 年,犹太代办处(Jewish Agency)^②负责人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建议租购纳米恩沼泽,但由于阿拉伯人的反对与民族冲突的不断升级,遭到委任统治政府拒绝。直至 1942 年,委任统治当局为减少士兵疟疾发病率,才开始清理沼泽。以色列建国后,纳米恩沼泽被完全排干。

另一重要案例发生于北部加利利地区(Upper Galilee)的胡拉谷地(Huleh Valley)。胡拉谷地有巴勒斯坦最大的湿地,当地生活着数千名阿拉伯村民,他们采集纸莎草制作席垫和篮子。^③犹太移民认为,该地区的沼泽被排干后能够提供广阔的、有价值的农业用地,对犹太移民至关重要。^④1934 年 10 月,约书亚·汉金以巴勒斯坦土地开发公司的名义购买了胡拉谷地的特许权。^⑤早期的排水措施包括燃烧纸莎草以使土壤干燥、清理该地区的植被和在低洼水池上喷洒煤油以杀死按蚊幼虫等。^⑥然而,胡拉湿地排干工程的成本过于高昂,预计将高达 500 万法郎。^⑦当地的阿拉伯人要求英国委任统治政府补偿损失,其强烈抗议活动阻碍了沼泽排干工程的推进。加之 1936—1939 年阿拉伯起义的发生,使犹太人无法获得委任统治政府的资金支持,排水计划未能实现。以色列建国后,犹太民族基金会重新宣布了排干胡拉湿地的工程计划。直至 1958 年,排干胡拉沼泽的任务才最终完成。

总体来看,犹太人对沼泽的治理方式因地制宜,主要包括建立地下排水系统、河道整治、建设排水沟和灌溉沟、开凿运河和种植桉树等办法。这些工程都需要复杂的技术与高昂的资金投入。在委任统治时期,委任统治政府启动了以消除疟疾为目标的城市排水项目,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则开展大型农村排干沼泽的计划,^⑧但有时实际工作也会由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犹太移民及工程公司联合承担。^⑨在 20 世纪上半期,尽管这些环境治理工程并未全部完成,但其奠定了日后以色列环境治理的重要基础。20 世纪 50 年代,以色列建国后,纳米恩沼泽与胡拉沼泽等最后几个大型沼泽地被排干,巴勒斯坦地区总计 18 万杜纳姆的沼泽地被整治殆尽,疟疾得到根除。^⑩大多数沼泽地被排干后

① Anat Kidron, "The Colonial Swamp in Mandatory Palestine: The Na'amien Wetlands between Local and Global British Interests in Palestin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60, No. 1(2024), p. 86.

② 该组织为哈伊姆·魏茨曼于 1929 年创立的犹太复国主义机构,总部设在耶路撒冷,在帮助犹太人定居、安置犹太移民、争取国际支持与发展经济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③ 胡拉谷地遍布湿地,水草丰美。当地阿拉伯村民长期奉行“半游牧主义”(Semi-nomadism),在湿地上饲养成群的水牛和骆驼,在不同草场之间阶段性迁徙。参见 Ghazi Falah, "The Evolution of Semi-nomadism in Non-desert Environment: The Case of Galilee in the 19th Century," *Geo Journal*, Vol. 21, No. 4(1990), p. 397.

④ Warwick Tyler, "The Huleh Lands Issue in Mandatory Palestine, 1920-1934,"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7, No. 3(1991), p. 346.

⑤ Ruth Kark and Noam Levin, "The Environment in Palestine in the Late Ottoman Period, 1798-1918," p. 14.

⑥ Glenna Anton, "Blind Modernism and Zionist Waterscape: The Huleh Drainage Project," *Jerusalem Quarterly*, No. 35(2008), p. 86.

⑦ Sandra M. Sufian, *Healing the Land and the Nation: Malaria and the Zionist Project in Palestine, 1920-1947*, p. 172.

⑧ Uriel Kitron, "Malaria, Agriculture and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Past Campaig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ciences*, Vol. 17, No. 2(1987), p. 298.

⑨ 例如,喀巴拉(Kabbara)地区的排水工程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与英国委任统治政府联合行动的结果,他们计划在该地区排水以发展盐业,打造以灌溉为基础的集约农业。参见 W. P. N. Tyler, "The Huleh Concession and Jewish Settlement the Huleh Valle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0, No. 4(1994), pp. 828-830.

⑩ Manfred Wasserman and Yehuda Neumark, "The Conquest of Malaria," in Manfred Wasserman and Samuel Kottek, eds., *Health and Disease in the Holy Land: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Medicine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Lewiston; Edwin Mellon, 1996, p. 400; Alon Tal, *Pollution in a Promised Lan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Israel*, p. 54.

转化为耕地,为以色列大力发展农业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排干沼泽改变了巴勒斯坦的生态环境,对阿拉伯人的农牧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①阿拉伯人不仅被限制放牧,而且被委任统治政府禁止进入林业保护区。此外,对沼泽湿地的过度排干使得地下水位下降与土壤干燥,化肥残留物硝酸盐浓度过高,对农作物产生危害,也使物种数量大为减少。以色列学者约拉姆·巴-盖尔(Yoram Bar-Gal)和什穆埃尔·沙迈(Shmuel Shamai)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所构建的环境叙事被夸大,大面积排干沼泽的行为并无必要。^②

(二) 植树造林与巴勒斯坦景观的改造

森林同沼泽一样,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树可以牢固扎根在巴勒斯坦的土壤中,能够充当“代理移民”的角色。每棵树代表一个犹太个体,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森林,象征着植根于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③树木一旦扎根,便象征民族的重生。因此,正如犹太人将排干沼泽视为对土地的治愈,植树既能通过在土壤中扎根来改善巴勒斯坦衰败的景观,又能够象征性地成为连接犹太人与土地的一种方式。

在现实层面,植树造林也能够为生态环境的改善提供独特价值。首先,植树造林能够直接改善土地状况与生存环境。犹太民族基金会是第一个在巴勒斯坦地区植树造林的犹太人移民组织,以色列建国后,该组织成为林业的主管机构。基金会土地开发主管约瑟夫·魏茨(Joseph Weitz)^④大力倡导造林计划,他认为:“即使所有的土地都适合农业耕种,也必须将一部分土地留给森林,特别是在山坡地区,防止雨季从山上流过的溪流把大部分肥沃的土壤带到海里。”^⑤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第三任主席、植物学家奥托·瓦尔堡(Otto Warburg)也认为,植树造林将改善以色列的气候并有助于经济发展,他建议将亚洲、澳大利亚和非洲的树种引入巴勒斯坦。^⑥其次,植树可以快速划定土地,造成犹太人占有土地所有权的既定事实,确保更多土地被纳入犹太人的控制。^⑦新的林地景观淡化了当地阿拉伯人的生存轨迹和历史痕迹,从而干扰了景观记忆。^⑧奥斯曼时期的土地法规定树木的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分离,但种植三年的树木将成为土地所有者的财产。如果犹太人不种植树木,这些土地将保留为自然放牧区,对阿拉伯人开放,而犹太人建造的人工林地往往最终演变为犹太人定居的标志。结果,植树成为占据巴勒斯坦更多空间、掩盖阿拉伯人历史痕迹的重要手段。最后,树林能够提供美学价值。许多犹太移民来自欧洲森林繁茂的地区,他们对巴勒斯坦环境面貌的改造暗含着对欧洲景观的强烈渴望。^⑨同时,他们期望在巴勒斯坦的荒凉土地上复兴《圣经》中的景观。《圣经》和犹太法典等古代文献描述了森林茂密的场景,表明古代以色列的大部分土地被森林覆盖,拥有20多种树

① 排水活动往往使得牧群的饮水处变得干涸。例如20世纪30年代末,巴勒斯坦北部胡拉山谷的阿拉伯人失去了牧群原有的饮水地,更多土地被用于支持犹太定居者从事集约灌溉农业。参见Roza El-Eini, *Mandated Landscape: British Rule in Palestine, 1929-1948*,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276.

② Yoram Bar-Gal and Shmuel Shamai, "Swamps of the Jezreel Valley: Struggle over the Myth," *Sociologia Internationalis*, Vol. 25, No. 2 (1987), pp. 193-206; Sandra M. Sufian, *Healing the Land and the Nation: Malaria and the Zionist Project in Palestine, 1920-1947*, p. 346.

③ Iru Braverman, "Planting the Promised Landscape: Zionism, Nature, and Resistance in Israel/Palestine," *The 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 Vol. 20, No. 1 (2001), p. 327.

④ 魏茨在20世纪30年代被任命为犹太民族基金会的土地与林业部门主管,制定了多项造林政策,被称为“以色列林业之父”。

⑤ Hadas Yaron, *Zionist Arabesques Modern Landscapes, Non-Modern Texts*, Boston: Academic Studies Press, 2010, p. 93.

⑥ Derek Penslar, "Zionism, Colonialism and Technocracy: Otto Warburg and the Commission for the Exploration of Palestine 1903-07,"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25, No. 1 (1990), pp. 143-160.

⑦ Joanna C. Long, "Rooting Diaspora, Reviving Nation: Zionist Landscapes of Palestine-Israel,"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Vol. 34, No. 1 (2009), p. 72.

⑧ 参见邓燕平:《巴勒斯坦的口述历史、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西亚非洲》,2021年第3期。

⑨ Hadas Yaron, *Zionist Arabesques Modern Landscapes, Non-Modern Texts*, Boston: Academic Studies Press, 2010, pp. 93-94.

木。在罗马统治时期之前,撒玛利亚、卡梅尔山、加利利和赫尔蒙山都被森林或常绿树木所覆盖。^①

巴勒斯坦地区的树林在奥斯曼帝国晚期曾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伐木、建筑、木炭生产和过度放牧使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天然树林与灌木丛已然消失。^② 大规模的人为破坏始于19世纪30年代易卜拉欣帕夏统治时期,他在巴勒斯坦境内大肆砍伐森林,为埃及提供造船和取暖所需的木材,致使中部丘陵和山谷中仅存的森林被砍伐殆尽。^③ 19世纪中期,蒸汽动力锯木机使得森林砍伐的效率大幅增长,至1900年巴勒斯坦仅存约100平方公里的天然林,它们通常被分割成一片片小而孤立的林地。^④ 到20世纪初,最后一次对森林的重大破坏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军队为修建通往西奈半岛的铁路,砍伐了沿海沙龙平原和其他地区的大量森林,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橡树、杉树和橄榄树的数量严重减少,约60%的橄榄树被砍伐用作燃料,卡梅尔山上的松树林也被夷为平地。^⑤

委任统治开始后,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的林业部门和犹太民族基金会开始合作,试图恢复天然林并重新造林。1920年,委任统治当局颁布树木保护条例,设立林业局主管林业工作。条例宣布巴勒斯坦境内所有森林均受政府保护、控制和管理,并划定40多个林业保护区,规定砍伐树木必须得到官员许可,并对放牧做出严格限制。^⑥ 尽管英国当局恢复植被政策的初衷可能并非出于环保的考虑,^⑦ 但这项政策客观上保护了林地风景区,并使卡梅尔山和梅隆山等地的林地得以缓慢恢复,为犹太民族基金会的植树造林活动提供了便利。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植树造林活动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其中犹太民族基金会承担了大部分工作。大规模种植森林的系统规划最初在1903年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提出,大会决定将植树造林作为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的重要手段。有关专家在进行考察后,建议优先种植橄榄树等果树,认为果树有助于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根据这一提议,犹太移民在1908年建设了第一块林地,并以赫茨尔的名字命名。这片林地主要栽种橄榄树、葡萄藤和少量杏树,但由于计划失误和行政问题,种植的数十万棵树仅有约20000棵存活下来,预期的经济利润化为泡影,宣告了以农业项目为导向的造林政策的失败。^⑧ 此后,植树造林政策被重新拟定,桉树和松树逐渐成为主要树种。

罗斯柴尔德和犹太垦殖协会也参与了小规模植树造林,他们在新定居点附近展开造林活动。在此期间,桉树成为首选树种,在1920年前种植的树种中约有78%是桉树。^⑨ 第一批桉树种子于19世纪80年代从澳大利亚运往巴勒斯坦,第一棵桉树也是从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进口而来,种

① Avinoam Danin, "Man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Thomas E. Levy, ed., *The Archaeology of Society in The Holy Land*,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8.

② Yoram Yom-Tov, "Human Impact on Wildlife in Israel Sinc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Daniel E. Orenstein, et al., eds., *Between Ruin and Restoratio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Israel*, p. 64.

③ Martin Sicker, *Reshaping Palestine: From Muhammad Ali to the British Mandate, 1831-1922*, Westport: Praeger, 1999, p. 13.

④ J. Donald Hughes, *The Mediterranea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Santa Barbara: ABC-CLIO, 2005, p. 119.

⑤ Roza I. M. El-Eini, "British Forestry Policy in Mandate Palestine, 1929-1948: Aims and Realitie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5, No. 3(1999), p. 75.

⑥ Alon Tal, *Pollution in a Promised Lan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Israel*, p. 45.

⑦ 恢复植被的计划与英国殖民主义的发展理念产生了共鸣,政府认为需要改善巴勒斯坦的贫瘠景观,防止土壤侵蚀与荒漠化,因此将植树造林纳入其殖民战略中。因此委任统治政府限制阿拉伯人放牧,以保护巴勒斯坦的原生林。政府的林业工作侧重于水土保持并减少土壤侵蚀,但由于财政预算有限等原因未能取得较好成果。参见 Roza I. M. El-Eini, "British Forestry Policy in Mandate Palestine, 1929-1948: Aims and Realities," p. 134; Gideon Biger, "Ideology and the Landscape of British Palestine, 1918-1929," in Alan R. H. Baker and Gideon Biger, eds., *Ideology and Landscap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73-196.

⑧ Shaul Amir and Orly Rechtman,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 Policy in Israel in the 20th Century: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Vol. 8, No. 1(2006), p. 40.

⑨ Alon Tal, *Pollution in a Promised Lan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Israel*, p. 78.

植在特拉维夫南部伊休夫的农业学校。^① 桉树种植的流行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桉树是快速生长的树种，6年内可以长到20米高，树干半径达到1米；其次，桉树对排干沼泽十分有效，能够在湿地中吸收大量水分。通过这种方式，桉树将植树和沼泽排水这两项富有象征意义的生态活动结合起来，推进了犹太复国主义开垦土地的目标。例如，在19世纪90年代末，罗斯柴尔德和犹太垦殖协会大规模引进桉树，用于哈代拉的沼泽排水。不久后，桉树种植就扩展到了佩塔提克瓦和兹奇隆亚科夫(Zichron Ya'akov)。1908年果树种植项目遭遇失败后，桉树便成为定居点种植的最主要的树种。这种树通常在春季种植，逐渐成为犹太定居点的一大特征，阿拉伯人甚至一度称桉树为“犹太人的树”。

随着大量沼泽地排水工程的成功和疟疾发病率的下降，桉树不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优先选择的树种。^② 在1920年至1925年间，犹太民族基金会种植的所有树木中有53%是桉树，一年后降至32%。到1930年，犹太民族基金会几乎不再种植桉树。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表明，单一种植桉树容易对土壤、水文、植被和生物多样性产生不利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更为系统的林业工作逐步展开，松树、金合欢树和柏树逐渐取代桉树成为最主要的种植树种。在这一阶段，阿勒颇松(Aleppo Pine)成为犹太民族基金会种植人工林所使用的主要树种。1926年，犹太民族基金会在巴勒斯坦种植的69 335棵树中，阿勒颇松的比例已占到一半以上，1930年这一比例继续增长，至1934年达到98%。^③ 阿勒颇松又称耶路撒冷松，植物学家迈克尔·佐哈里(Michael Zohary)将它视为《圣经》中的油树，后来的研究表明阿勒颇松是远古时期从北非引入巴勒斯坦的树种。这种树能够适应多种气候，拥有在各种土壤中茁壮成长的能力，存活率极高，易于种植且成长速度快。^④ 此外，20世纪30年代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和英国政府的冲突持续加剧，使得犹太民族基金会更倾向于选择大规模单一种植阿勒颇松，以尽快控制更多的土地。

然而，更加单一化的树种种植同样产生了有害后果。阿勒颇松的易燃性使其在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冲突中经常成为纵火燃料，茂密的松树林地使得野生动物生存的生态系统恶化，生物多样性受到影响。大多数种植区进行了深耕并喷洒除草剂，严重危害了当地的植物群落和野生动物。松蚜等病虫害在大规模单一化的松树种植中更易传播，害虫会使树枝干枯，有时数月内便可导致树木死亡。^⑤ 20世纪80年代初，犹太民族基金会逐渐改变其造林政策，将种植密度降低并调整种植间距，树种也更加丰富，不仅将松树与原生林一起种植，而且推动灌木丛和阔叶林逐渐恢复。^⑥

物种入侵所带来的危害在该时期也逐步显现。在“田园城市”与“田园郊区”等理念的影响下，犹太定居点通常会为树木和花园设立专门的区域。20世纪初的景观设计师通常认为，巴勒斯坦本土的自然景观太过贫瘠，主张大量引进外来物种。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大约有250个外来物种从20个国家引入巴勒斯坦，包括柏树和为稳定沙丘而进口的怪柳、石松及澳大利亚的金合欢树等。^⑦ 大量外来物种造成生物入侵，带来了相当大的生态破坏。例如，金合欢是英国林业学家使用最多的用来稳定沙丘的植物，不幸的是，它成为一种有害的入侵物种，开始主宰海岸景观，破坏了自然生态

① Roza I. M. El-Eini, "British Forestry Policy in Mandate Palestine, 1929-1948: Aims and Realities," p. 78.

② Sandra M. Sufian, *Healing the Land and the Nation: Malaria and the Zionist Project in Palestine, 1920-1947*, p. 41.

③ Alon Tal, *Pollution in a Promised Lan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Israel*, pp. 79, 84.

④ Alon Tal,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Evolving Perceptions and Strategies," in Daniel E. Orenstein, et al., eds., *Between Ruin and Restoratio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Israel*, pp. 120-121.

⑤ Alon Tal, *Pollution in a Promised Lan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Israel*, pp. 85-86.

⑥ Yoram Yom-Tov, "Human Impact on Wildlife in Israel Sinc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Daniel E. Orenstein, et al., eds., *Between Ruin and Restoratio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Israel*, p. 65.

⑦ Elissa Rosenberg, "'Something from Nothing'—Constructing Israeli Rurality," *Landscape Research*, Vol. 44, No. 5(2018), p. 6.

系统的平衡。^① 在以色列的一些地区,物种入侵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妥善解决。

20 世纪上半叶,大部分树林被种植在巴勒斯坦中部和北部较湿润的地区。它们包括约 51% 的松树林、约 8% 的桉树林和约 27% 的混合林,剩余为橄榄树等其他原生树种。^② 在 1948 年之前,犹太民族基金会种植了最多 13 000 杜纳姆(约 1300 公顷)的林地。^③ 尽管相较于委任统治政府种植的 54 000 杜纳姆(约 5400 公顷)林地,^④ 这一数字相形见绌,但是其形成了辐射效应,在以色列建国后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植树造林的总面积便超过了整个委任统治期间的造林面积。此外,植树逐渐成为犹太复国主义重要的宣传工具,后者通过景观构建记忆,用以呼吁世界上不同地区的犹太人返回以色列。1920 年,犹太历 5 月 15 日的“古树日”(Tu Bishvat)被完全改造为犹太复国主义式的植树节:“一群兴高采烈的孩子乖乖地排成队,挥着铲子种下象征他们的幼树。”^⑤ 在植树完成前后,犹太民族基金会还推出捐赠证书和邮票作为构建认同的有效手段,使世界各地犹太人感受到他们通过树木与巴勒斯坦土地联结在一起。犹太民族基金会第一任主席约翰·克瑞穆尼斯基(Johann Krementzky)鼓励制作特殊邮票,将犹太移民定居与植树的场景描绘在邮票上。^⑥ 这些物件呈现了未来犹太国家的景观蓝图,引发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家园的想象。

结 语

长期以来,巴勒斯坦地区尤其是耶路撒冷在西方的历史叙事中居于重要地位,同时也是流散的犹太人历史记忆的中心。然而他们对巴勒斯坦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宗教经典的影响,缺乏对巴勒斯坦地区客观的、现实的认知。近代之后,大量西方和犹太探险家、学者到达巴勒斯坦,他们观察到的当地环境和社会现实与其历史记忆形成了强烈反差。在东方主义的叙事逻辑下,西方将巴勒斯坦地区视为环境衰退与文明退化之地,有些人将其原因归结为气候变化,更多的学者则强调所谓“沙漠民族入侵”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这种扭曲的文明观念是近代西方对西亚北非地区认识的缩影,深刻影响了近代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想象:一方面,一些近代犹太复国主义者接受了该地区环境和文明退化的说辞;另一方面,犹太人认为自身具有重新改造巴勒斯坦环境、推动该地区“文明化”的使命。这种环境观念隐含着双重救赎,即对巴勒斯坦环境的救赎与对犹太民族的救赎。由此,犹太复国主义者构建了阿拉伯人的衰败与犹太复兴的二元叙事模式,试图将巴勒斯坦贫穷和落后的蛮荒之地修复为生机勃勃的新家园。这些认识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建立了犹太移民之间的关联,同时也试图解构阿拉伯人与巴勒斯坦地区的联系。

在上述观念的影响下,犹太移民在“让沙漠开出花”口号的感召下,进行了大规模的环境修复实践,主要体现在排干沼泽与植树造林等方面。这些活动通常伴随着土地购买、移民和土地开垦等活动,并成为巩固犹太定居点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环境的重建在某种意义上被赋予修复巴勒斯坦土地、救赎犹太民族和恢复宗教经典中田园景观等使命。现实中的环境修复与历史记忆、犹太民族的革新相互链接,赋予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合法性,有助于提升犹太移民的民族认同。在犹太移民控制的土地中,大部分沼泽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排干,大大降低了疟疾等传染病的发病率,大量树木栽培的成功也为建国后更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打下了基础。尽管以色列建国前犹太移民占据的土

^① Alon Tal, *All the Trees of the Forest: Israel's Woodlands from the Bible to the Present*, pp. 36-40. 诸如此类的物种入侵案例还有许多,例如为消除疟疾、捕食蚊虫而引入的食蚊鱼(*Gambusia affinis*)进入洼地后,使得火蜉蝣的幼虫被食蚊鱼大量捕食,造成了相当大的生态破坏。

^② Yoram Yom-Tov, "Human Impact on Wildlife in Israel Sinc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Daniel E. Orenstein, et al., eds., *Between Ruin and Restoratio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Israel*, p. 65.

^③ Alon Tal, *Pollution in a Promised Lan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Israel*, p. 66.

^④ Alon Tal, *All the Trees of the Forest: Israel's Woodlands from the Bible to the Present*, p. 55.

^⑤ [英]西蒙·沙玛著,胡淑陈、冯桦译:《风景与记忆》,译林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 页。

^⑥ Joanna C. Long, "Rooting Diaspora, Reviving Nation: Zionist Landscapes of Palestine-Israel," pp. 67-68.

地相对有限,^① 环境改造实践及其影响更多是局部性的,但这些经验为此后以色列进行环境治理和改造提供了重要的实验样板。

犹太人早期对巴勒斯坦的环境叙事模式,深深植根于西方关于西亚北非地区的“环境退化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的文明等级论。沼泽和沙漠等景观只是自然现象,但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将其赋予文化意涵,成为东方主义视角下的畸形景观,需要施加所谓的“生态改造”,并以此强化民族认同,为犹太移民提供合法性。然而,早期犹太移民对生态环境的过度改造,不仅产生了负面的生态影响,而且恶化了阿拉伯人的生存环境,引发了两个群体之间的持续冲突。阿拉伯人被排除在犹太人的环境叙事之外,其古老的生态智慧遭到否定,影响延续至今。

责任编辑:郑广超

Restoring the “Degraded Land”: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and Management of Palestine by Jewish Immigrant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YING Tian-yi, YAN Wei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9, 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times, the West depicted Palestine as a barren landscape that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what is depicted in the Bible, and attributed this deterioration to the Arabs. After the emergence of Zionism, it followed the Western environmental narrative of Palestine, but endowed itself with a “dual mission” of restoring the “degraded land” of Palestine and redeeming the Jewish nation. With the influx of Jewish immigrants and substantial land acquisitions, influenced by the environmental narrative, extensive environmental transformation initiatives such as swamp drainage and afforestation were undertaken by Jews to get rid of malaria and enhance land productivity. This aimed at restoring the “degraded land” while reinforcing Jewish national identity. These environmental practices enhanced living condition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for Jewish immigrants, facilitating their establishment of historical and tangible connections with Palestine and serving as a model for environmental transformation in Israel. However, this exclusive narrative and corresponding environmental practices exacerbated tensions between Arab and Israeli communities, sowing seeds of conflict.

Key words: Jewish immigrants; environmental narrative; Palestine; Palestine-Israel conflict

^① 在1948年以前,犹太人占据的土地未超过巴勒斯坦地区领土的6%。参见 Alon Tal, *All the trees of the forest: Israel's Woodlands from the Bible to the Present*, p. 46。